

親愛的同學，我其實是……： 同志教師出櫃抉擇及其教學經驗 之探討*

喬虹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廖述揚

亞洲大學
心理學系

邱苡家

苗栗縣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林勻婷

國立清華大學
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

陳詩穎

喜憨兒社會福利基金會
松山工坊

本研究旨在探討同志教師在教職場域抉擇是否向同事及學生出櫃的思考歷程及其教學經驗，透過質化研究中敘事研究為典範，邀請五位在不同教育階段服務之同志教師分享其在教職場域如何有意識選擇出櫃或不透露自己的同志身份、其在教育職場上的出櫃經驗、以及出櫃對於教學工作的影響，由故事發展嘗試理解同志教師的身份認同、個人信念、工作／教學理念如何在教育現場上交會，其同志身份認同如何影響他在教學專業上的處境，進而塑造其在職涯發展。希望藉此研究結果能夠鼓舞未來更多研究者能從事各行各業同志認同及出櫃議題相關研究，以增加社會大眾對於恐同及性別偏見歧視的認識，降低對同志及性少數族群的壓迫。

關鍵詞：出櫃、恐同、同志教師、性別歧視、同志

* 1. 通訊作者：喬虹，hungchiao@gmail.com。

2. 本研究獲科技部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MOST 107-2420-H-002-007-MY3-Y10707），僅此誌謝。

同志教師包含了「同志」和「教師」兩個身份概念的交會（何春蕤，1997）。同志教師除了需要面對自我認同議題，還需要面對異性戀主流的校園體制思維、師生與同事相處等（徐巧玲、周幸儀，2016）。臺灣的同志教師研究指出，同志老師們擔心因同志身份的曝光帶來標籤化、自己的專業被質疑、被學生家長施加壓力而工作不保（施毓琳，2005；徐巧玲、周幸儀，2016；袁逸農，2014；葉人暲，2009；鍾寧，2019），由此可知在校園中的出櫃須面臨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故為避免影響工作，同志教師大多不考慮在職場中出櫃。出櫃帶來的恐懼與不出櫃長期隱瞞自己的同志身份，使自己與環境他人保持距離所產生的隔閡，都讓同志教師進退兩難（徐巧玲、周幸儀，2016）。Herek 與 Garnets（2007）指出出櫃（包括對自我和他人）是同志認同發展重要的里程碑，出櫃程度高者也會擁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因此為提升同志教師的心理健康，學習應付與邊緣化（marginalization）有關的壓力實際上可以促進某些技能發展，這些也可以幫助同志個人在職業上發揮領導作用（Fassinger et al., 2010），在性別平等的校園氛圍中提升校園中教師與學生的幸福感（DePalma & Atkinson, 2006）。以下針對污名化、同志教師身份認同及職場出櫃策略相關研究進行文獻探討。

（一）同志面對的污名化

污名化會讓目標群體被剝奪權利和社會邊緣（Fassinger et al., 2010）。Mays 與 Cochran（2001）指出有被歧視過的人，生活處境會變得困難，且無論是否為同志身份，其心理健康狀況會較差。為改善同志被污名化的處境及提升心理健康，需先了解同志被污名化的原因，可分為文化社會和個人的污名兩種，分述如下：

1. 文化社會的污名化

在文化脈絡中，異性戀是在生活各方面都被假定成「正常」的基礎，例如：在同志未出櫃以前，所處環境會直接將所有人視為異性戀（Haddad, 2019）。這樣的異性戀結構概念無意識的嵌入到生活各個層面：法律、宗教、健康和社會等制度中，塑造出異性戀是正常、自然和優越的，而任何與異性戀相反的人、事、物，都被視為異常、不正確和錯誤的，將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者塑造成是生病、不道德、邪惡的（Fassinger et al., 2010）。

2. 個人的污名化

個人的污名化是個人在心理上，以制定的污名化（enacted stigma）、感覺的污名化（felt stigma）和內化的污名化（internalized stigma）三種形式被表現出來的反應，包含因避免對同志的排斥與暴力而刻意隱瞞否認自己的身份或與他人保持距離、因感受到用非語言的行為方式被攻擊而產生恥辱感、對此恥辱感產生持續恐懼或先發制人的防衛反應，以及接受污名並納入自我概念中，導致自我污名化、自我憎恨、身份否認和身份隱瞞（Goodman et al., 2008; Herek et al., 2009; Herek & Garnets, 2007）。

整體而言，面對文化社會與個人的污名化，都對同志自身的心理健康造成影響，因此同志身份的認同，對同志心理健康而言有其關鍵性。

（二）同志教師之身份認同

1. 同志教師之身份認同

同志教師包含了「同志」和「教師」兩個身份概念的交會，教師在既有印象裡代表了為人師表，從古至今教師的身份從未包含性的意涵，故同志教師的身份會特別地引發眾人的焦慮（何春蕤，1997）。Epstein 與 Johnson（1998）認為學校是異性戀公共空間，同事間對同志態度可分為寬容與排斥的。寬容亦即當同志決定不發聲時，他們將尊重同志的隱私權和沉默權（Rudoe, 2010）。教師們也必須對同志的話題保持沉默，以維持學校的異性戀架構（DePalma & Atkinson, 2006; Nixon & Givens, 2004）。在這樣的環境中同志的經驗不被重視，並被降級到私人領域，而這樣的架構也

造成同志教師出櫃的阻礙，也可以解釋為同志的職業身份不如異性戀者的身份真實，構成了同志教師在學校場域沉默的原因（DePalma & Atkinson, 2006; Haddad, 2019）。部分男同志教師具有較高的同志身份自我認同，較能在職場中展現自我，亦有人選擇隱藏自己的身份，清楚劃分教師／同志身份（施毓琳，2005）。國外對同志教師的研究則顯示其會通過積極的身份認同打斷校園的異性戀規範，透過生活經驗、家庭養育和社會文化地位方面的經驗使他們獨特的風格完整了同性戀教師身份（Haddad, 2019）。

2. 同志教師身份認同對教學之影響

教師之身份，相當於教室內的領導者。當同志身為領導角色時，通常會有兩種歸類，一個為具專家身份的同志（professional gay），意指同志的身份成為其當領導者的核心，而領導身份被人看見的很少；一個為具同志認同的專家（gay professional），意指性傾向為個體的一部份，而領導身份能被人看見（Fassinger et al., 2010）。部分教師認為若自己的身份與教學內容無關則不提及。若出櫃符合教學目的，則會視情況出櫃，以故事化的自我揭露經驗，結合課程內容則更具說服力（駱芳美，2017）。而同志身份可能會影響未出櫃的教師在工作場域提及同志議題的態度，因擔心談論同志議題或教育可能引發曝光的風險，而在同志教育及議題上較異性戀教師更保守，在教學上亦較常採取偷渡式同志教育，或頂異性戀教師的面具進行同志教育（洪巍峯，2014）。而同志教師是否具有同志的身份認同進而影響其教學，何春蕤（1997）認為答案並非二分的，每種身份的教師都有其不同的敏感、立場與經驗，因此同志教師的特殊性並不一定比非同志教師有顯著的差異。

綜合上述，同志教師之身份認同對其教學態度之影響，可能依個人的成長經歷所塑造之個體價值觀而有所不同。故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試圖理解同志教師的身份認同、個人信念、工作／教學理念如何在教育現場上交會，及其同志身份認同如何影響他在教學專業上的處境。

（三）同志教師之出櫃困境與策略

在校園中的出櫃須面臨許多不可預期的風險，許多教師在面臨職場出櫃議題時，最大的擔心及顧慮來自於出櫃後可能影響其工作。2001年任職於桃園某國中的段健發教師公開出櫃，當時引發社會的討論與質疑，甚至該縣議員李訓求要求地方政府清查所有教師之性傾向，還好時任教育局長及教育部長皆表達力挺該同志教師（余金來，2001）。研究指出，臺灣男同志與女同志教師選擇不在職場中出櫃，除前述所提自我認同以及污名化影響等內在因素外，外在因素則為擔心出櫃後需面對家長、同事、學生等三個族群（洪巍峯，2014；施毓琳，2005；袁逸農，2014；葉人暲，2009；鍾寧，2019）。家長為男同志教師是否出櫃最主要的考量，擔心同志身份會讓家長對教職工作產生的影響；其次為同事，同事們對於婚姻上的關注常造成同志教師們極大的壓力，同志議題甚至成為其他同事的消遣話題、或將同志與愛滋污名連結，也有可能想導正其性傾向，專業形象及專業度遭質疑，加深職場對同志的不友善。最後是學生，有許多同志教師考量在校園出櫃，希望能發揮其正向影響，讓更多人看見並支持同志，Hynes（2012）指出當同志學生看到同志教師，他們會看到一個看起來像他們或表現得像他們的人，他們在教室裡會感到更安全和得到更多支持。在現實處境上，同志教師面臨擔心在性平教育上說太多或太深而曝光身份，但又想要宣導同志教育的矛盾當中。

學校可以被概念化為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兩者之間的界限不穩定（Rudoe, 2010），當教師在學校的各個地點之間移動時，他們可能會採用不同的「身份管理策略」（Griffin, 1991）。趙淑珠等人（2008）指出同志教師的四種現身態度，分別是：偽裝掩飾、消聲匿跡、暗示性現身及公開現身，而大部分同志教師不會主動宣布同志身份，也有人會把教育與同志分開，視為兩個場域處理。

出櫃會有一定的風險，而每個個體所面對的裝備、力量、處境、情感糾葛都不同，因此同志教師是否該出櫃這樣的二分法並不是真正的重點，該專注的應該是那些想要出櫃的人預備了什麼樣的具體護衛和支援（何春蕤，1997）。學會應付與邊緣化有關的壓力實際上可以促進某些技能發展，這些技能才能幫助同志個人發揮領導作用（Fassinger et al., 2010）。學者建議想要出櫃的同志教師以下兩點策略（何春蕤 1997；Blount, 2006; Epstein & Johnson, 1998; Haddad, 2019; Rasmussen, 2006; Rudoe, 2010）：

1. 尋找同盟

除日常在工作環境中耕耘良好人際關係外，也可認識職場的其他男女同志並與其建立關係形成同盟，亦或參加其他同志社運團體。

2. 身份與權力

取決於主管對同志教師身份的尊重以及對同志教師本人的尊重。這種對尊重的強調可以理解為對「好老師」身份的投資，或者表示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好老師的重要性，成功的專業身份可以賦予權力，這對於抵禦學校恐同氛圍是必要的，無論老師的性別如何，保持權力和避免失去控制都是非常重要。教師在學校中越有勢力和受人尊敬，性傾向引起壓力和擔憂就越少。

故可知在同志教師的職場中，先建立同盟為自己尋求夥伴，而後在教學上建立好名聲，以此專業身份為自己獲得權力和可控性，則可降低出櫃所帶來的負面效應。現有研究多為單獨關注男同志或女同志教師，而無綜合不同性傾向認同與多元校園場域研究，故本研究想要了解「多元文化認同如何交互影響同志教師職涯發展」及「恐同及偏見歧視如何壓迫不同校園場域的同志教師向學生展現真實及立即性的多元性平教育機會」。

方法

本研究採質性研究方法，以敘事為研究典範，述說者故事的內容以及說故事的角度透露出故事主角的核心信念、建構出價值觀及世界觀（Lieblich et al., 1998）。本研究由故事發展嘗試理解同志教師的身份認同、個人信念、工作／教學理念如何在教育現場上交會，其認同如何影響教學處境。

（一）研究參與者

1. 受訪者基本資料與簡介

本研究共招募 5 名自我認同為同志且目前在臺灣各級公私立學校任教之教師進行訪談，訪談期間橫跨 2015—2016 年，研究參與者在受訪當時的基本資料如下。

表 1
研究參與者基本資料

暱稱	小桃	小安老師	Cindy	樹老師	大刀少女
性別	女	男	女	男	女
年紀	> 30	> 30	> 25	> 40	> 45
職稱	教師	專任輔導教師	專任教師	代理輔導教師	教授
服務單位	國小	國中	完全中學	高職	大學
區域	北區	南區	北區	北區	中區
最高學歷	碩士	碩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教學年資	8	6	4	10	16
認同	同性戀	流性戀／疑性戀	雙性戀	同志	同志

（1）小桃。小桃老師擔任國小低年級的導師，每天從早上七點半上班到四點下班，每週平均約有 16 節課的教學份量，帶領班上二十幾個學生學習。會選擇國小老師作為職業除了在年幼時便接收到父母的期待外，小桃也認為自己身為女性又喜歡小孩子，老師的工作穩定度又高也十分符合自己的個性，因此大學時便就讀師範院校修習教育學程，念完研究所實習後便從事國小教職。小桃定義自己的認同是「婆」，目前也在同性親密關係之中。她從來沒有向父母出櫃，僅有「帶比較中性的朋友回家」時父母可能有過懷疑卻不敢直接與她討論，面對父母的擔心，小桃用開玩笑和否認帶過。

(2) 小安老師。小安老師的教學經驗包含國中和高中職，他描述專輔教師的工作內容大量且龐雜，除了每天要與 3—5 個學生進行個別晤談與撰寫紀錄之外，還需聯絡老師、家長及社工，這些系統工作複雜且困難，常呈現過度耗能的狀況。小安在國中以前就知道自己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但是當時可以感覺到環境對同志不友善，參加大學的性別社團聽到性別與性傾向可以流動的概念，以及在研究所做相關性別研究，才決定認同自己是流性戀／疑性戀。在高中時期，他經驗到在電話裡向班上最好的朋友出櫃而被大聲重複吼「GO TO HELL」。這個經驗對他而言是很大的打擊，還好當時校內有出櫃跟公開挺同的老師、同志學長照顧他們，而且後來全校對同志友善的氣氛佳，因此幫助小安度過了這個困難時期。小安的父母都知道他的同志認同，因此小安更可以告訴別人他父母知道他的同志身份。

(3) Cindy。Cindy 從大學開始就有家教經驗，修完教育學程、完成實習之後便擔任教職至今。在學校主要擔任中學英文教師，每週約有 26—28 節課，班級人數 35—50 人不等。Cindy 自述自己曾是以一個異性戀女生活在這世界上，直到大三去美國工讀旅行時遇到第一個女朋友，認真思考後即接受自己雙性戀的新認同。但當時她向自己生命中最親近的母親出櫃而遭到母親嚴厲的反對，母親採冷戰的手段，不論 Cindy 如何向她撒嬌或陪笑，母親完全不理不睬，後悔當初答應讓女兒出國，並認為自己的女兒生病了。其實 Cindy 的母親透過大眾媒體早已知道不少關於同志的基礎常識，但是她仍然拒絕接受自己的女兒是同志的事實。Cindy 因為擔心媽媽的身體狀況承受不住，因此決定「還是當個乖女兒好了」。還好 Cindy 的弟弟和朋友都給予支持與同理，但是為自己與母親的關係從此不再如過去那樣親近感到非常難過和遺憾。

(4) 樹老師。樹目前於高中任教，除了上生涯規劃課程、入班做班級輔導外，每天還要接 3 至 4 個個案。樹過去擔任代理輔導教師的經驗豐富，大部分中等教育學制的學校類型都有接觸過。當訪談者邀請樹分享他的同志認同時，樹開宗明義地就表明自己有恐同，因為他非常討厭被標籤化。更進一步認識樹的脈絡，樹自述自己原本來自大家族，幼年時曾遭遇父親家暴，父母離異後跟著母親生活，因此不認（識）其他親屬，唯一掛念的就是母親，但如此親的母親也曾傷他很深，曾在他幼年時用「娘娘腔」來指責愛哭的他，直到現在樹仍難以釋懷。他同時也表示母親大概已經知道他的身分，但彼此不戳破。他的弟弟曾在家中扮演支持他的角色，但後來因為弟弟基督教的信仰使得他們倆在這個議題的立場相對。從過往求學的經驗來看，樹並沒有因同志認同或身份而受到欺負或歧視的經驗，但在只要這個社會仍然視同志為異類而有不友善的態度，他可能會持續鏡映著社會的恐同狀態，而最終他需要面對的可能還是母親，樹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跟母親出櫃，他認為當目標達到時，他將再也無所懼。

(5) 大刀少女。大刀少女有 16 年的教學年資，主要教授大學部與研究所之課程。大刀少女自述在高中時期即與女同學於校園中有親密互動，但那時候自己並沒有那個同性戀概念，也沒有認知是否為愛情。而當次的事件被教官發現，父母親也知悉了，父親並未表示什麼，但母親非常焦慮，將其帶去看心理醫師。大刀少女記得當時醫生的建議是「這是一個過渡期，等到你考上大學之後」可能就會不一樣。而在升大學之際，大刀少女被當時女友提分手，理由是女友認為「同性關係很變態」，這也是大刀少女第一次接觸對於同志的強烈歧視語言，且是從伴侶口中說出，對她而言是一大打擊。而後大學時期有與異性交往之經驗，但感情涉入不深。在讀研究所時期，同性戀在那個年代還是非常污名，偶然閱讀女性主義的論文時看到 lesbian 一詞，才理解到 lesbian 僅是一個中性不帶歧視的詞彙，重新建構她對同志一詞的看法。

2. 研究者

第一作者為具有諮商心理學博士學位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長期關注性別與同志／性少數心理健康相關議題，第二作者目前就讀於諮商心理科系碩士班，現任性別相關社會團體理事，大學期間並擔任同志友善社團社長，於大學期間有撰寫同志主題畢業專題。第三作者為目前在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從事服務之諮商心理師，第四作者目前就讀於諮商心理系碩士班並從事碩三駐地諮商實習，在研究所有修習研究方法的學習經驗，第五作者目前從事教育類工作及準備報考諮商心理研究所。除

第二作者為生理男性之外，其餘作者皆為生理女性。雖然團隊成員存在著性別、同志認同、年齡、學經歷與職業等差異，但在分析與撰寫研究結果的過程時五位作者分屬五個不同的單位，且無現存師生或論文指導之利益關係。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工具訪談大綱由第一作者擬定，提綱包含三大部分：教師身份與教學經驗簡介、同志認同與教師角色的關係、以及在生活與職場上的出櫃經驗（包含同事、長官與學生等）。在教師身份與教學經驗主題上，研究者主要希望受訪者能暢談其教育理念、教學風格、對於安全教學與教育環境的想法，以及如何拿捏自己對於學生價值觀的影響程度；關於同志認同發展與教師角色之間的關係，研究者主要想了解受訪者對於自身同志認同的發展史以及如何看待自己是一個擁有性少數身份的教師；最後一部份關於生活及職場上的出櫃經驗分享，研究者邀請受訪者暢談生活及職場中的形象管理，他們是如何決定是否要揭露同志身份、以及揭露後如何影響職場上同儕互動。

(三) 研究程序

第一作者作為本研究計畫主要規劃與資料蒐集的執行人，於計畫及訪談大綱撰寫、通過研究倫理審查後進行研究參與者招募，初期透過網路同志社團（如，臉書同志助人者社團）宣傳以招募研究參與者，第一作者並連繫認識的同志教師朋友，請他們幫忙推薦及招募同志教師受訪者，以滾雪球方式招募研究參與者。訪談由第一作者主責，訪談地點由受訪者指定，訪談開始前請受訪者填寫研究同意書及基本資料，四場訪談為面對面、一場訪談為線上形式並同時錄音，於訪談後由團隊成員將錄音檔謄寫成逐字稿，而後進行資料分析。

(四) 研究資料分析方法與品質檢核

本研究以敘事研究典範，嘗試理解主角敘說故事中的核心信念、價值觀及世界觀（Lieblich et al., 1998）。研究訪談之逐字稿經由團隊合力先依個別受訪者經驗進行整體內容分析，而後採針對本研究核心主題：同志教師出櫃經驗進行核心概念分析。研究團隊首先會完整閱讀每一份逐字稿，嘗試取得每一位受訪者整體主觀經驗的描述並撰寫摘要式故事記錄，以故事精華要素取得對於受訪者經驗的整體印象；而後再根據故事內容進行主題式分門別類，並整合所有受訪者的類別集成主題；最後研究者將會回頭閱讀所有訪談稿，以取得研究參與者對於其出櫃考量的結構趨勢、在教學現場的出櫃經驗故事整體結構。研究分析採團隊形式進行，由於團隊成員存在著多元認同與經驗之差異，在研究初期，第一作者作為研究主要規劃者因擁有較多關於本研究相關之背景知識，負責帶領研究團隊蒐集研究相關文獻資料與帶領討論，以豐富團隊成員知識並培養討論默契；當研究團隊正式開始進行資料分析時，成員先個別分析每個訪談稿並定期聚會討論，在討論過程中，由各個成員輪流帶領分析討論、邀請每個成員輪流發言交換意見並互相檢視彼此在分析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盲點，以共識最大交集點求趨近受訪者的主觀世界。

結果

研究結果將採兩類呈現方式，因為五位研究參與者分別在五種不同教育階段，為呈現其同志教師認同、教育理念與教育場域交織之特殊性，故先呈現其個別故事，再呈現綜合全體結果之綜整分析。

(一) 個別資料分析結果

1. 教育界很保守又八卦：國小任教的小桃老師

(1) 小桃是國小老師。談到小桃老師的教學理念與風格，小桃認為在國小低年級階段的孩子人格

發展是最重要的，因此她致力於培養孩子的生活習慣以及負責任的態度。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滿欠缺的是那種就是譬如說負責的態度，雖然他們也都是滿乖乖可愛的啊，但是譬如就是東西物歸原位啊，然後東西亂丟啊，然後跟你借完廢紙就是弄得一團亂啊，都是有可能。」（小桃-19）

她也會注意學生的人際互動，尤其是國小低年級學生在互動過程中常會有大小糾紛而來找老師評理：

「他們就是會流於那種想要一個更權威的人來，壓住他們，或幫他們以牙還牙，他們覺得『爽』這樣子，然後就覺得不能這樣，我覺得就是要讓他自己了解那種感覺，然後讓他自己學會怎麼去處理。」（小桃-28）

身為國小老師，小桃很清楚孩子深受家庭和性別刻板印象的影響，在情緒表達以及人際互動裡會觀察老師的反應，尤其特別注重公平性，因此她在管教學生時會提醒自己對待孩子要公平合理，並鼓勵學生對待同學要有同理心與包容心，還會在課程中會融入性別的思考。

「譬如說講完灰姑娘，我就會在講一個灰王子，平衡一下，然後讓他們覺得說，ㄟ——那其實不一定女生一定就是等人家解救啊，就是，你才跟人家跳過一次舞，你就要跟人家結婚嗎？他就說：老師我才不要」（小桃-41）

因此，小桃很彈性開放地將重要的生活與性別教育融入她的教學與班級經營中，在訪談過程中聽她侃侃而談自己的教育理念與作法，似乎能一窺她對於教育的熱情。

（2）小桃的職場經驗。小桃描述她的職場經驗，相當大的篇幅著墨於同儕間的互動，她描述老師們生活圈單調，因此助長了八卦流傳，許多人尤其從異性戀觀點來試探她的親密關係：

「就是一定會有歧視阿，或者是譬如說在學校那一定會很多人都會不管跟你熟不熟硬要問你有沒有男朋友？職場，一定會有那很多那種婆婆媽媽來問阿，當你又越神秘她們又越想知道，越想要刺探。」（小桃-66, 68）

而小桃也從與他們互動的經驗中學到同事們對於性別角色的看法，這對於小桃評估自己同志身份是否可能會被接受有一定的影響：

「我只能說我覺得教師圈還是蠻保守的，畢竟很多會去當老師的人或許他們的家庭本就比较保守的」（小桃-78）

「他們更不用講同志，他們連那種……男女之間的……就是都還是很傳統……然後以就是我可以煮飯……餵飽老公小孩為一生的職志為榮。」（小桃-265, 268）

小桃並非完全不願意與同事分享自己隱私和生活的人，而是在異性戀系統的框架下，身為非異性戀以及擁有非異性親密關係與系統裡的人太不同：

「假如是異性戀的話，真的會很容易……就是把很多事情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欸！就譬如說就是……嗯……結婚權哪～然後就是大方討論自己男朋友老公啊怎樣啊……老公又怎麼啦～小孩又怎麼啦～可是我覺得相對而言，真的是會對……比較弱勢的人，會比較少關注。」（小桃-152, 153）

「同事女生之間就是……通常聊一聊一定都是會聊感情，才會覺得說喔我們是那種交換秘密的那種好姊妹，我覺得有時候真的是，一種可惜吧……我如果沒有辦法跟對方講我感情的時候，對方會覺得說，欸我什麼都跟你講了，但是……其實你還是防著我那種感覺。」（小桃-188）

教師在校園內的人際關係其實挺重要的，因為完整在學校的時間扣除掉教學與班級經營，其實會有許多機會跟其他老師互動，有好的關係也是小桃所期待的。整體而言，小桃在職場同儕教師的互動與分享彼此的生活中觀察到了大部分同事懷傳統異性戀角色期待與分工，雖然她希望能有更輕鬆的人際關係，但為了不被八卦和歧視淹沒，她需要謹慎保守自己同志身份，而選擇性地分享自己的生活。

（3）老師 X 女同志（婆）的教學現場。小桃自述跟學生的關係很好，她很喜歡跟學生閒話家常，學生可以跟她開玩笑，也喜歡跟她分享自己「他們很喜歡自己講……跟你分享……老師我跟你說，其實我喜歡誰誰誰～」（小桃-130）只是因為學生不知道她的同志身份，「只是他們在問說老師你結婚了沒有老師你生小孩沒，什麼的……這時候就沒辦法回答他們這樣子。」（小桃-255）

當訪談者邀請小桃老師分享身為同志對於她教學的影響，她表示自己在面對性別議題的覺察可能較高：「班上如果有比較……女性化的男生，就是可能就是我就會特別鼓勵他，就是說哇～他好厲害什麼什麼好厲害喔！」（小桃-108）她也會在教學中鬆動學生的性別刻板印象：

「或者是說…在情緒上面也是可以帶啊！譬如說……欸那你們覺得細心……是……我剛開始會故意先不要用比較二分的方式，譬如說欸你覺得細心是比較像男生……或女生會有的特質？他們剛開始都會分得很……刻板印象的答案，那後來我就問說，欸那醫生要不要細心？還是……我就誇大的說還是醫生就是可以開刀開一開刀……刀子留在裡面？什麼的然後他們就啊～然後他們後來還發現欸其實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我們原本認為那樣子的刻板印象。」（小桃-119, 121）

身為同志的小桃老師，亦或者說身為老師的女同志（婆），小桃在她的工作中，將其對性別議題的敏感度細緻地融入在她的教學中，她也跟導生建立了很不錯的關係，讓導生可以主動向她分享許多秘密，雖然目前並沒有同志學生跟她出櫃，但她可以提供學生接納和常態化的反應，讓學生在她面前感到被接納。

（4）職場出櫃？最害怕的其實是家長。小桃雖然對於自己的教學跟帶班有很高的自主權和效能感，但是考量到職場環境與教育圈的相對保守，她並不打算要在職場上更進一步出櫃。當訪談者邀請她想像出櫃最大的風險，她說：

「我害怕的點其實應該不會是學生，通常都是在害怕的是家長。最沒辦法承受，喔就是假如就是家長知道啊！然後家長開始在那邊唉喲～那老師是同志～然後他會不會對我女兒怎麼樣什麼什麼的。」（小桃-96, 206）

然後她就接著自嘲：「就會覺得喔～是不是想太多了，我又沒有戀童癖，呵呵。」（小桃-207）

而這個對於家長會抗議的假想阻礙，其實是從教育圈乃至整體社會保守風氣的一個象徵：

「對我來說就是……老師圈就是……真的就是保守的一個枷鎖。如果真的以各行各業行業別來講，我覺得老師圈……教育圈真的是低耶……包容度是低的。」（小桃-259, 263）

2. 重視社會正義的小安老師

(1) 小安是國中專輔老師。小安老師自述他在求學不同時期曾有不同的職業夢想，後來國高中時期因為受到輔導室很多的幫忙，故而想當老師「就覺得我家幫忙我的不多，但是這個社會跟學校幫我的很多，所以我想要成為一個老師幫忙更多跟我一樣的孩子。」(小安-02)談到小安老師的教學風格和理念，他很常使用分組討論的形式搭配少量的講課，他自述「我這個人會覺得說社會正義沒什麼好妥協的，所以他們會感受到一個很強烈的重視社會正義的老師」(小安-16)，而且他會在第一堂課便開宗明義地闡述他的課堂規則：

「我剛開始在第一堂課的時候，我一定都會先講好的規則就是尊重、熱情、正義等之類的，這是在課堂上面他們不能講不尊重別人的話，比如說歧視女生的話、歧視身心障礙者的話、或是歧視男生、歧視同志……但是如果他出現了，我也會跟他討論為什麼他會出現，他的想法是什麼，但是他知不知道這想法是會傷害人的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先講好說大家在一個尊重的環境下大家才會覺得比較安全。」(小安-13)

他深知自己身為老師在課堂上對學生能產生的影響力，並希望用這個影響力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又安全的討論氛圍，因此他會給時間和空間讓學生能在課堂上發表自己的想法並與同儕討論，他會適時制止不尊重人與歧視性語言，但並不會以老師的身份要求學生接受他的立場。

「就是在別人也在說不合適的話的時候，可以挺身而出，表達他的立場，也不一定要去制止別人，或要別人不可以做什麼，但是我希望我的身教表達的是，至少我可以表達我的立場，不同的意見跟聲音。」(小安-20)

(2) 同志教師的職場經驗。在聽小安老師職場經驗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他在實習過程中，因遇到恐同的實習指導老師而差點無法完成實習的故事。實習指導老師發現了他與同校實習的男朋友的关系：

「(督導)他就說同性戀不可以當輔導老師，同性戀不適合當輔導老師，所以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困難的事情。如果不是之前覺得自己應該做的都有做之外，大概那事後其實會有一個很大的矛盾，就是我真的是不是因為是同志所以我就不能當輔導老師。(小安-52, 53)，就會編很多的理由出來在這件事情之後，就說我是一個不適合當老師的老師。」(小安-72)

當時的爭議甚至讓校長跟他校的家長會長討論，說出：「他能力很好啊，如果他不是同志的話他以後可以當主任。」(小安-55)這樣的評論傳到小安耳中，不禁讓小安深切自我懷疑：「我就會想說，所以我是同志的話我在教育圈我的生涯發展就會受到限制。」(小安-56)更甚者，因為實習的受阻讓家人擔心，因此家人開始反對他與男友的交往，原本支持他與男友關係的母親態度大轉變到要求他們分手，而父親和哥哥也在母親的影響下希望他們分手，「我就覺得已經夠混亂了……而且那個輔導老師他要求我們要終止實習。」(小安-62)過了這麼多年後再憶起這段往事，小安在訪談中仍情緒難過到哽咽：「對，那時候還蠻想死的。」(小安-60)

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能存活下來，小安倚賴的是背後強大的社會支持資源跟挺他的校長：

「我跟除了老師講，還有跟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夥伴講，對所以我覺得是靠他們作為內在支持跟資源走過……」(小安-64)

「系上老師是陪我，就是會一直陪我們聊天，會找我們談話，然後用網路或是我們回學校返校的時候趁機跟他們談。然後他們也有打電話來關切，跟校長關切，然後他們就是親自來關切，但是也不能怎麼樣。原本我是想說就終止實習就好了，就想說老師這條路也不是我一定要走的路。」(小安-67)

還好校長沒有放人，最後小安完成實習取得教師證，但是這個經驗也讓小安對於國中教職產生負面想法。

然而，哪怕是在實習階段經歷了歧視、甚至被嚴重威脅工作權的經驗，小安在正式教職工作中仍有許多出櫃的經驗，他採取的策略是：只要你敢問我就敢說。

「有一天校長也是問我結婚了沒？我說沒有我只是有對象但是不能結，他說是女朋友嗎？我說不是，是男朋友。但是在這之前有先打聽過他的風聲……這個校長是 ok 的你可以跟他講，所以我就有直接跟他這樣回答。……然後後來有關一些同志的事件議題，他也會找我去討論，請我幫忙想一些方案什麼的，所以這個校長給我的經驗也是蠻好的。」（小安-96）

小安在向校長出櫃之後，還把他的同性伴侶帶到領域教師群的聚會，因此後來他也能在輔導室內公開討論伴侶。除此之外，小安還有許多校外性平相關主題演講的機會，作為演講者的他倒是較願意在演講中分享自己的同志身份：「因為我覺得讓他們看活生生的人、直接問些活生生的問題還是重要的。」（小安-189）

（3）老師 X 同志的輔導工作現場。身為一個同志專任輔導老師，會比較容易有學生跑來找他出櫃嗎？

「我在 OO 國中比較少的同志學生跟我出櫃，那……我就會一直想是不是我做的還不夠這樣子，但是一方面我也會想，是不是跟那個認同的年齡跟成熟度有關，但是我覺得是……作為國中專任輔導老師，比較少機會跟學生接觸，那就會讓他們少了一個接觸一個同志友善老師的機會。」（小安-177）

既然許多同事都知道自己的同志身份，會接到其他同事轉介同志學生嗎？

「目前沒有。就是國中生……不太被允許有感情的議題，所以他們就算有感情也不太會讓老師知道啦，何況是同志間的感情。」（小安-180, 181）

既然現在的輔導工作中少有同志學生，是否就意味著小安不需要跟學生出櫃呢？

「到他們畢業之前，我都會說這是最後一次兩次晤談了，這件事情我不希望你們以後說我是在騙人，所以我想跟你說：你嘴巴裏頭一直說的那個老婆或是女朋友但那個詞是你們加的，不是我放的，我一直都講我的伴侶我的另一伴，那我的另一伴他是個男的。」（小安-105）

當然，出櫃後的他就要滿足學生各種好奇心：

「那你們怎麼做愛的啊？這種典型問題就還是一定會出現啊，啊你們交往多久？你們有沒有想過要結婚啊？你們要不要小孩啊？他就會有很多很多的問題是對一般同志的問題就會跑出來。（你會一一回答學生的問題嗎？）當然啊，覺得這是對同志教育最好的機會。」（小安-112, 113）

但小安也不是對每一個受輔學生都出櫃：

「如果（師生）關係沒那麼好我也不需要說啦，（學生）他不會主動來關心我的另一伴的事情我也不會說。我覺得有說是因為我覺得那個是真實的關係，我在意我們之間真實的關係，這是第一個點。第二個點是我希望他以後記得有一個對他曾經有點幫助的輔導老師是

個同志，然後不要誤以為他的身邊只有有異性戀，而是一個他信任且有好的傾向。」（小安-107, 108）

然而在國中社團活動中，小安是選擇不出櫃的：「因為我覺得我比較擔心的是……他們回去怎麼跟他的導師、跟他的老師、跟他們的家長講，我並不想造成其他的困擾跟我自己的困擾。」（小安-131）

除了輔導活動之外，小安也有機會在課堂上講述性別或同志相關主題的議題，因為其豐富的知識而曾引起學生開玩笑，但他一笑置之後學生仍然認為他是異性戀：

「我雖然沒有講我認同但是我有公開挺同志啦就這樣。就是例如說我以前上課的時候公開講說我是支持同志的參加同志運動什麼什麼的，會有同學說那老師你是不是喜歡男生？我會說我喜歡男生也喜歡女生這樣子。他們就會說老師你這麼博愛一定是 gay，他們會開我玩笑啦，就開一開這樣子而已，他們不會很認真。（我）就笑一笑阿，就呵呵呵就過去了。」（小安-03, 104）

在課堂和輔導室之外，小安也努力營造友善校園：

「還是會常常想說我有沒有為我的同志學生做些什麼，這個部分是我覺得……最常會縈繞在我心中的。像輔導室有一個公佈欄一直都貼著跟同志有關的訊息，然後就覺得這件事情也會讓我覺得比較安心跟自在，因為我給自己營造了一個較友善的環境。」（小安-173）

3. 以友善同志樣貌現身的 Cindy 老師

（1）Cindy 是中學英文老師。談到教育理念，Cindy 表示自己喜歡讓學生思考、培養學生問題解決的能力，因此她會放手讓學生自己嘗試，而她則扮演支持陪伴的角色，她認為在資訊發達的今日，學生其實可以自己在課餘時間自己找資料學習，因此老師能給的就是學習的方法、試著傾聽或站在學生的立場幫忙一起解決問題，因為那是機器做不到的部分。她並不會想給學生無微不至的照顧或無條件的關心和關愛，而是保持適切的師生距離。她說：「我是不會期望自己的影響力多大，但是我會希望能在特定的情境的時候，我能夠也許就是讓他們對自己不要負面評價這麼嚴重。就像我剛剛說的，如果今天遇到某件事情，然後馬上就被其他人斥責或被長輩斥責。就是可能要跟學生聊就是他們這樣講有他們的原因，但他們也要相信自己這樣做並不一定是錯的。」（Cindy-19）

除了觀察到青少年跟師長之間的衝突之外，Cindy 也想鼓勵孩子能好好跟家長溝通：「其實青少年他們本來跟家長就有很多想法不一樣的地方。我給的方向會是：你還是會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你還是可以部份滿足家長對你的期待。然後你也不用因為就是長輩說了什麼話就全盤否定自己，然後就把自己的那一部分全部都藏起來。」（Cindy-38）

（2）同志教師的職場經驗。Cindy 認為學校是一個相對保守的地方，尤其可能欠缺同志相關知能：

「我覺得我記得我剛進去的時候也是班上的女學生跟隔壁的學姐就……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剛去，我第一個就想到輔導室，因為我覺得不管怎樣她們都比我專業這樣子對啊，然後去（輔導）主任就開始跟我講一些「她只是一個過渡期，你要讓她改正這樣的行為。」然後我還有找另外一個老師，然後他的想法也是類似這樣的說法，就是「你就是不要再讓她那個……讓她再去找男生」……所以從那次之後我就再也不找輔導室了，就是事情就自己來啊，我覺得我來可能還比他們好很多這樣。」（Cindy-94, 95）

因此，Cindy 學會了向長官保守自己的秘密，若要跟同事出櫃，一定做足了功課：

「同事的話我會開一下雷達，gay 比較好認，拉就話就是要花點時間，然後 T 還明顯一點，那雙就更難找了啊。可能就是你可能先跟這個老師聊天，然後我會藉由學生的個案來探

一下這個老師的態度是什麼……就是私底下聊天如果是契合的話，那我還是會跟友善的圈內同事出櫃。我出櫃之前是做足功課的，你問就是講出來這樣子。」（Cindy-48）

「那如果可能我有一個同事還蠻可怕的，就是他可以接受女同，但是他對於學生女女交往還是會千百般的阻礙，他會說我真的很認同她們這樣沒關係，但是他會私底下跑去跟學生說你要不要考慮男生？我有問到他對於雙性戀，他說雙性戀根本就不能存在啊，然後馬上就可以知道這種人就是不要再講下去了。」（Cindy-49）

那學生呢？在跟學生互動的經驗中，有任何人知道 Cindy 的同志身份嗎？

「因為是面對中學生那我還是要保護一下自己，免得他們亂傳就是不知道傳到什麼版本，所以就是以一個直女來定位自己。那當然就是會告訴他們說有這樣的故事都是我朋友，但他們還是會說：老師其實就是你的故事吧，一概否認到底，不管是不是我的故事。」（Cindy-41, 42）

唯二的例外就是兩個學生（兄妹皆為同志），Cindy 是先知道了他們的同志身份，在關心陪伴他們的過程中自然地向他們出櫃，讓接下來的陪伴與輔導更直接自在。雖是如此，Cindy 在她的職場是不太會出櫃的：

「基本上是不太會（出櫃），尤其是他們還在學校，我跟他們講那麼多故事，他們也很清楚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友善，就是讓他們有這樣的感覺，所以我覺得出不出櫃對我來說沒那麼重要。」（Cindy-44, 46）

(3) 老師 X 同志的教學現場。英文科老師的教學內容雖然好像有固定領域教材，但其實 Cindy 上課活潑也喜歡融入各類題材：

「只要有稍微關鍵字我就可以直接跳過去講這樣子。不會到特別刻意（聊同志相關的故事）。如果那個班級本身就是沒有那麼成熟、沒有辦法聽你說這些故事，那就不太適合講。所以我比較多用心在講故事比較像是高中年級的學生。尤其講特定故事的時候你看到某些同學眼睛亮了，你就會知道也許是觸動到他生命的某一部分。」（Cindy-34, 35, 36）

Cindy 在課堂上做的這些事情、分享這些故事，是跟她的同志認同有關嗎？

「嗯嗯，因為我覺得這很重要，我都這麼的自責前面以一個異女在這樣子看世界，所以我會希望如果能把這些東西帶給他們，其實也不只是同志議題，就譬如說弱勢或者說環境保護等等的。」（Cindy-31）

(4) 出櫃是為了支持孤單的學生以及獲得盟友，沒有安全工作環境就免談。既然用假裝自己是異性戀的姿態仍然可以教書，那為何需要出櫃呢？

「如果要出櫃的話，我會覺得是要妳的出櫃對這個學生影響很大，那才會值得我去出櫃，不然我覺得沒有必要去做這個動作。講個極端的例子，比如他現在覺得世界上只剩下他一個人，然後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同志的心情這樣子，然後妳看老師們也都異性戀啊什麼的，然後他就覺得他快要死掉啊之類的，這是我覺得我的……告訴他我是同志老師，這對他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時間點。」（Cindy-67, 68）

所以看起來 Cindy 認為對學生最必要性的出櫃是為了能幫助同志學生，那為何需要向同儕教師出櫃呢？

「也是一種需要被認同的感覺吧，因為工作時間很長，就會希望工作環境裡有一些可以了解妳的人，那如果妳跟幾個比較熟，那如果妳遇到什麼事情，妳能夠立即的去跟他們分享，那就馬上做到同仇敵愾的效果，他也可以同理妳。我需要（得到盟友支持），不然會覺得很孤單。」（Cindy-64, 65）

雖然出櫃有種種好處，所需承擔的風險也是不少，因此對 Cindy 而言，學校若能給教師充足信任，才能打造最安全的工作環境：

「如果說今天學校他們覺得我做什麼事情不妥，可能就單就家長面或是學生面聽到什麼，就馬上來批判我，也不從頭到尾搞清楚狀況，那這樣對我來說就很不好，所以我會一直以友善同性戀的異性戀女老師來對外公開。但如果今天一個學校能夠願意傾聽、願意溝通、願意相信老師，我會覺得這樣子的工作環境才是最棒的！」（Cindy-17, 63）

4. 對自己的不一致很一致的樹老師

（1）樹是一個高中輔導老師。樹是個很喜歡教學的高中輔導老師，他的教學和輔導都是抱持著這樣的理念：「就是一個人的生命，那我如何去接觸、如何去撫觸、每一個在我眼前的生命。如何讓他們去知道我對他們的擔憂，這個擔憂當然有來自我過去成長的背景、跟我的經驗、跟我的服務的經驗，還有我如何看待現在的他們，然後如何跟他們一起去面對未來的他們的世界。」（樹-05）

除此之外，他更強調自己有明確教育立場的重要性：

「我告訴我自己是，做一個老師需要有立場的，你要有一個清楚的思考，讓學生能夠藉由你的思考去做一個他自己產生思考的東西，那個是重要的。」（樹-09）

樹舉例，一個常見也很重要的立場就是端正誠實與負責：

「我的端正就是自我負責、自我認同，就是這樣，然後不要找太多理由，該是你做的就是你。然後，不對就不對，就不要給我找理由，所以我不對我會跟我的學生道歉，我會跟他90度鞠躬「老師錯了。」可是你錯了，我就會告訴你你錯了，不要給我找理由，那該是你的責任就要去做到。」（樹-11）

因為他直言不諱的管教裡是堅定正直的立場，他作法雖然嚴厲卻受學生愛戴：

「所以我的學生都會跟我講一句說：老師被你罵很爽耶，就所有的老師罵，就是你罵我，我們都不會生氣。因為你罵我，是因為你真的把我放在心裡面。所以這件事情讓我知道這個端正是對的。」（樹-12）

（2）同志教師的職場經驗：同志 VS 教師。或許因為樹恐同的態度，當他在職場遇到同事關於私人生活的垂詢，他的反應只能出自於「生存本能」：

「我進教育界第一件事面試，我的主任就問我，那個時候我就知道啦。基本上我是一個敏感度跟觀察力很強很深的人，因為妳也知道嘛，在暗櫃裡面的人敏感度都會很強。我採取比較保守，而我這幾年的感覺是：這是對的。我沒有主動出櫃過，然後我也模糊掉這樣子，我現在的主任還認為我有女朋友。」（樹-88, 89, 90）

除了同儕之外，對於學生的詢問，樹也採相同政策和做法：

「有時候也會跟他們撒點小謊哈哈哈哈哈，因為我覺得我沒有必要那麼坦承……所以我的

學生如果問我，如果我覺得他是不友善的，「老師你有沒有女朋友？」，我就會說：「有啊！但關你什麼事呢？」」（樹-23, 57）

這個「撒小謊」的做法跟樹前面強調端正的教育理念實在是差異太大了，他也找到解套的方法：「後來我就在我的諮商所找到一句話：不一致中的一致，對，就是我知道我不一致，但是因為我知道我不一致，所以我知道我不一致，我也在做不一致，所以這件事對我來說是一致的。」（樹-92）

樹對自己在職場上的定義是「我就是一個老師，一個男老師，然後一個對於多元性別非常開放接受的男老師。」（樹-114），他坦言身份對他的影響：

「我是男同志又是家暴迫害受害者，又是單親又是鑰匙兒童，然後又跟著媽媽，所以我後來為什麼對於女性主義很有感覺，是因為我在我媽媽身上看到太多的壓迫了，因為她的壓迫我也受苦，其實我也受苦，所以我才對那個壓迫有感覺，我才開始對於所有受壓迫的族群才有感覺。」（樹-123）

（3）老師 X 同志的輔導工作現場。所以如此具有性別敏感度的樹在輔導／教學工作現場會如何運用自己推動業務呢？在個別學生輔導工作裡，他舉了一個例子：

「我上學期有一個學生，有天他突然就很有勇氣跑來找我說：老師我覺得我生病了。我就說怎麼了？他是個男生。「我會偷看很可愛的小男生，而且會看很久，然後我身體有反應」……我們就在討論這件事，可是，我發現當我在跟他討論這件事之後，我覺得很感動的是在他那個緊鎖的眉頭裡面我第一次看見他放鬆，我也跟他講……還沒有 18 歲之前怎樣都是可以的，你只是現在跟你認為大多數的人不同，反正還有兩年嘛，慢慢探索……然後讓我的同志的學生放鬆。」（樹-42, 43）

除此之外，他也會使用中性的語言和明顯的彩虹旗幟：

「我自己在學校談多元性別的時候，我會問：「你有對象了嗎？」就是我會在一些語言上弄得比較中性跟平等，不會那麼的絕對就是異性戀，這個認同意識我是有的。」（樹-95）

「我就會巧妙的插上彩虹旗啊，啊！你不要我放在這邊，我就放在這邊，然後我會找一個更高、更明顯的位置啊。」（樹-145）

在工作現場，除學生之外需要大量工作和合作的便是主管與同儕教師了。樹描述第一任主管要求他辦理守貞教育，因此開啟了他們大量的對話：

「第一個是我先讓他知道我願意去理解守貞的概念是什麼，我在他身上我知道一件事，他所要捍衛的守貞，就是他從小到大認為，我們如果把自己好好的顧好，好好的對情感跟婚姻有承諾，那不是建構在純粹為了性而性，基本上我覺得這樣的想法沒有不對，只是他操作成守貞教育，做法是不是可以討論？」（樹-64）

而這樣討論出來的工作同盟帶來之後合作的契機，從一開始完全不辦理任何性平教育活動到接納他桌上的彩虹旗：

「他跟我說他在我身上看見了一個輔導老師對於每個孩子的盡心盡力，他覺得這件事情他很感動，所以應該是說我的主任藉由我來看見我怎麼這麼接納我的學生，他對於我展現的這麼包容這麼看重學生的這面，我覺得是感動他的，我覺得這個感動讓我們的對話超脫了那個他本來很擔憂的那個多元性別。」（樹-65, 67）

樹甚至很樂於與家長對話：

「我是一個很願意叫家長來做親師會談的人，我三不五時就：把你媽媽叫來！這問題不是他爸媽的事嗎？你不叫他爸媽來我怎麼解決？所以我是很願意跟家長對話，而且很能夠家長對話完就讓他跟我合作了。我的孩子們還在這樣的家長下面活著，我要讓他們活的好一點啊。」（樹-76, 77, 146）

（4）可以為了學生勇敢、但自己躲在暗櫃。關於自己身為同志的身份是否要在職場公開，樹的內在思考與外在表現的確是矛盾與擺盪的。有時他被動和悲觀：

「我不喜歡我要為了我是同性戀這件事情，要去做那麼多努力的工作，我覺得我光把我自己是好好做一個同性戀是很累的一件事情，我要花這麼多力氣去跟你們這些無聊的人，我覺得那些是不必要的，你要說我喜歡躲在暗櫃我也覺得也 ok，因為我覺得我在找一個舒服的位置。」（樹-56）

又有時他主動和樂觀：

「反正我只要為了學生，我就很勇於發言，可是只要我要為了我自己，我就會變得非常的驚三哈哈哈哈哈。」（樹-13）

「我們長期以來，我們都關心這個議題，可是我們都沒有很多人，去……就是現身，這是我們的議題，但是我們選擇不現身，也就造就了這些人把我們當成空氣，或者是客觀的他們者，不！這是我們的事，我們要站出來。（陳雪）那個 po 文有讓我覺得，如果我要出來，我就要開始做捍衛我的權力這件事。」（樹-115）

5. 寧願讓學生不安的大刀少女老師

（1）大刀少女是大學教授。談到教育理念，大刀少女在美國求學時，深受教授的理念影響，認為與其讓學生沒有任何衝擊，不如讓他們感到不安，所以在教學過程中也會使用自身的生命故事為例子強化學生反思自身的生命經驗，希望激發學生有不同於以往的想法。此外，大刀少女也認為保持彈性，促進學生思考是她教學重要的一部份：

「就算是學生他上課提出了政治不正確的問題，或者是困惑的，我覺得這些都很好啊，或者他很不安，只要他願意說出來，沒有任何想法是不對的。我知道有些老師他等於說已經有一套思維在哪裡啊，什麼樣的議題，就應該要什麼樣是對的什麼樣是錯的，就可能然後我其實就很反感，那我覺得這對學生一點幫助都沒有，他從原先從黑白二分的世界進入到另外一個黑白二分的世界，這樣對他沒有什麼幫助啊，我覺得這個世界意義，幾乎所有的意義都是會變的，都是曖昧的。」（大刀少女-174）

（2）同志教師的職場經驗。大刀少女在工作上將公領域與私領域分得很開「就是我不跟我工作上頭的人講任何我的私事，包括我的宿舍在哪我都不講，我不希望他們介入我的生活，這跟我是不是同志沒有關係。」（大刀少女-74）、「我覺得那是一個那個領域然後保持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m……他們只是我的同事，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我不想跟他們做朋友，他們可能也不想跟我做朋友。」（大刀少女-74），所以在工作場域上從未主動出櫃。

在她教書初期時，曾遇到前女友瘋狂舉動，讓她擔心此情況影響到其教師專業形象：

「我就一邊走一邊在想……想事情，突然，那個女的跳出來，從路上跳出來，然後我很驚駭，然後呢，她可能有點精神方面的狀況，那一次我還真的蠻生氣的，也是因為這樣

子喔，我更加覺得在學校 come out 不是人家會對我怎樣，而是這會影響我的 professional image。」（大刀少女-84）

而該次事件讓她第一次需要面臨與工作場域出櫃：

「她連這種事都幹得出來，然後我就非常憂慮，我就想她沒有達到她的目的她會跑到我們系裡頭鬧啊，那我怎麼辦，我不得已，我只好打電話到系辦，然後跟……系辦秘書接了我就跟她說，某某真的很不好意思喔，就是我……通常我是不會講我私人的事情啦，可是這個實在是沒有辦法了，我必須要跟你講我是同性戀，她說老師我們大家都知道啊，妳拍那個紀錄片我們大家都看過了。」（大刀少女-87）

除此之外，大刀少女在教書的第一個學期時，即遇到同事因其性別認同而進行言語之騷擾：

「有一天，我在辦公室備課，結果他（同事）就打內線電話給我，叫我去他辦公室他有事要跟我講，我就進他辦公室啦，我進去之後他就站起來然後把門鎖起來。我就（覺得）奇怪什麼事？結果……他接下來就說某某啊……他說你來應徵工作的時候我們都以為你是同性戀。我就不回答他的問題，我就說：唉呀，我來告訴你什麼叫做性別認同，性別認同是多元的。他聽不懂，聽完很困惑，他就說：喔，所以你是雙性戀。我說阿：還是沒聽懂，我就再說：不是不是不是……你不能用這個標籤化。來，我再來告訴你。他聽了半天都沒有……因為他沒有達到他的目的，結果他就說：你是不是不喜歡男人？（心想）關你什麼事啊？那時候我聽了很生氣，我非常生氣，對啊，然後可是因為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助理教授，我又對這個環境很不熟悉，我不能夠發怒。」（大刀少女-112）

而後這名同事還跨界向助理探聽她的私事：

「他居然就找了我們這個同學，然後去他辦公室，他就問他就全部跟我有關的問題，然後特別問說我現在在跟誰在一起？」（大刀少女-116）

甚至因為此事影響其在學校的升等：

「後來我提升等，我第一次提，系教評會沒過，就我其它都沒問題，可是我們不是有個服務的項目？然後我服務成績好像是不及格。我那時候就有懷疑是他，可是我不確定。再等下個學期我要提，據說系辦開始打電話給系教評會委員嘛……然後開這個系辦的會，這個老師他居然就說我們上次在評案子的時候就說，他的觀察期至少是一年喔。之前沒有聽到這句話啊，系助跟我講的不是這樣子啊，我聽了勃然大怒。」（大刀少女-125, 127）

（3）教師 X 同志的教學現場。大刀少女自述在上課時會有固定會提到的一些例子，而這些例子往往會透露出自己的同志身份：

「上課的時候就會，『欸！我下個禮拜跟我女友……我以前跟女友……』，這個時候大家都會 wow，我不知道他們能不理解，大部分其實也不太清楚，他們比較是屬於『哇!!』的那種型。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就還不錯啦，擴展大家的視野嘛。」（大刀少女-19）

但是她並不認為這是種暗示性的出櫃：

「我只是幾個例子。我沒有想過那是出櫃不出櫃，因為那件事情對我來說是那麼的自然，我覺得全天下的人都知道。無論如何他們早就知道啦，聽到老師八卦高興死了。」（大刀少女-140, 142）

大刀少女在教學中需要有意識的思考要不要講關於同志的內容嗎？

「沒有，我比較會思考可能會是別的事情，對就是比較要是家裡的事，有時候會不小心講我媽媽，我就會趕快制止，就對我媽不太公平，雖然他很好笑。」（大刀少女-146）

由此可見，大刀少女雖然在大學職場曾因認同遭受不當對待，也將公私領域劃分清楚而沒有刻意在職場出櫃，但卻可以自然在課堂上用自已的同性親密關係作為舉例以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二）綜合資料分析結果

1. 當教師身份與同志認同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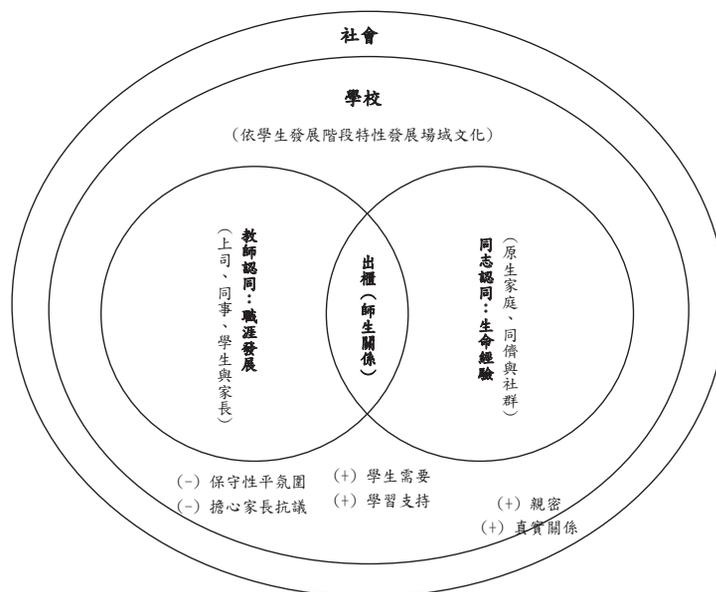
（1）「真實的我」為了學生而存在。綜合整理五位研究參與者的經驗，在不同教育階段根據服務學生發展階段的特性會產生不同特性的場域文化，例如國小老師因為小學生在他們的發展階段之教育需求更多需要老師介入、中學階段的老師服務之青少年之發展階段有性相關主題的討論與人際互動、大學階段的老師則根據其學門從是研究且教學大多有專業自主空間。雖然五位研究參與者的職業場域及其所服務對象的發展階段不同、教育目標與需求不同，他們關於同志認同發展的生命經驗亦不同、出櫃程度及與同志社群互動的程度也不同，但我們發現他們在私領域的同志身份認同與公領域的教師認同交會之處，即是在師生關係中揭露自己的同志教師身份，而且此揭露不是為了表達與表現自己的需求，而是為了學生學習與輔導之需要才揭露真實我。例如國中專輔小安老師向受輔學生出櫃後回答學生同志經驗相關問題、中學英文科 Cindy 老師向同志兄妹學生出櫃後能更加直接自在給予他們關心陪伴、大學任教的大刀少女老師用自已與同性伴侶相處經驗作為教材等，因此自身的同志認同成為珍貴的教學及輔導策略。同志老師身為社會中的少數人以及被壓迫的經驗亦能在課程教學中為學生帶來多元觀點，例如如國小小桃老師鼓勵學生融入性平思考、小安老師強調社會正義的輔導活動課、Cindy 老師的英文課可以講弱勢或環境保護、樹老師其用生命教育的理念在教學輔導和行政中營造同志友善環境、大刀少女老師的教育理念更是要創造學生的不安感以激發多元思考。同志教師各自用自已多元豐富的生命經驗、具有創意的教學方式，將性別平等、社會正義等概念依據學生發展與學習階段所能吸收的程度融入他們的教學，他們的思考以及行為的出發點皆是為了實踐他們教育理念的最大化。可謂是在教育現場這個職場脈絡中，五位同志老師是以學生為中心、教育為優先的思考與行動。

（2）學校職場氛圍對同志教師思考與行動的影響。在研究結果中，除在大學任教的大刀少女老師之外，其餘四位老師都有提到他們經驗到保守的校園氛圍對他們的影響，例如小桃提出她藉由觀察到國小職場上教師同儕之傳統性別角色看法和八卦風氣而讓她決心不能出櫃；小安老師曾因為恐同的實習指導老師而差點無法完成實習，雖然當時校長幫忙解決但仍然評價小安同志身份不適合當主管；Cindy 發現輔導室同仁採「改正同志學生經歷過渡期」的概念在輔導同志學生，從而推估既然所謂學校中理應當擁有較多多元性別專業知能的輔導同仁都如此表現則更無法對其他教師同儕有所期待；以及樹老師需要與主管周旋討論如何辦理守貞教育，而守貞教育在傳統概念上是由基督宗教倡議、被視為相對保守的性別教育作法。受訪的五位老師皆有提到擔心遭受到同事異樣看待、擔心受到恐同或反同的家長抗議，而採取刻意隱瞞甚至說謊來掩飾可能會遭受污名化及歧視的性少數身份。這些擔心確實阻礙了研究參與者更自在地在教育現場與上司、同事及學生互動，但這些擔心也不是空穴來風，而有些是被真實發生過會影響職業生涯發展的困境（如，小安老師在實習時被督導刁難、大刀少女老師被同事言語騷擾跟刁難升等），因此最後，所有研究參與者們都給同志老師們一致的建議：若想要出櫃，一定要先審慎評估環境的安全性。在國小服務的小桃不意外地建議要保護自己，有多次向學生出櫃且能在演講中開放自己認同的小安也異口同聲認為原則是：不安全不出櫃。Cindy 老師也有相類似「保護自己、評估狀況、確定對方友善和信賴程度、會影響未來相處的程度」的想法。在教育現場如此一心為學生衝鋒陷陣的樹建議同志教師可進一步思考現身的目標和目的、事前與後路的準備、預期損失等。唯一不買單出櫃議題的僅有大學教授大刀少女，雖然她也同樣建議出櫃前須先評估環境的安全性，然而她認為更重要的是做到自己該有的專業表現，因為專

業表現將影響別人的看法以及未來發聲的權力：「因為你的職業是一個老師，是一個研究者，你在你的職業上頭 be professional……如果要去 argue 然後有人欺負你，那你還可以非常振振有詞，我作為一個老師表現都合格啊。」（大刀少女-154）

綜上所述，研究者將五位受訪者的整體經驗由圖一呈現：受訪者同時擁有教師認同與同志認同，而其交會之處即為在師生關係中之出櫃經驗，在此出櫃經驗之前，同志教師要面臨長度不一的抉擇過程，其內在抉擇考慮因素可能包含對其所在學校職場性平氛圍的評估及考量來自家長的壓力，而前述兩項通常是削弱其出櫃的動機；但同時若考量到學生學習的需求、同志學生被支持的需求、與學生擁有真實關係（不想欺騙或誤導學生）、或想要與同志學生更親密（當見到同志學生受同志污名所苦，透露自己擁有同種受污名的身份能產生「我們是一樣的」之親密感）等因素，則可增加同志教師出櫃之動機。而無論是增加或降低出櫃動機之因素，其推力與拉力作用皆源自於所處之學校場域及社會交織出獨特文化脈絡之設定，尤其是學校場域會依學生發展階段特性及社會認定該發展階段所對應的階段性任務不同會發展出很不同的文化，故同志教師服務於不同教育階段也會受該教育階段場域文化脈絡之影響。例如：雖然家長可能都會對教師如何教育子女有個人意見，但相較於國小學生仍在家長監護權之下，大學老師的專業自主權較高，相對不需要擔心家長會到校抗議教材內容不合己意、更不需要擔心校長會顧慮家長抗議而要求教師修改教學內容；而社會對於國小學生以及大學生在其教育階段所應接受的教育有不同的期待（如，品格教育之於批判性思考），故相對應的老師功能與教學方式的評鑑標準便會不同，也帶給想要用自己的生命作為教材推動性平教育的同志教師不同程度的彈性與壓力。

圖 1
同志教師認同與出櫃抉擇考量



值得一提的是，圖一雖看似是扁平的 2D 圖形，但其內涵卻是動態跟對應著同志教師生命發展歷程而具有生命力的，因為教師認同會隨著職涯發展不同階段而有所深化或改變、同志認同會隨著生命經驗及與重要他人關係之改變而流動，當然學校乃至社會的氛圍與文化規則亦會隨著時代更迭而有改變，而圖中列出正負向因素為本研究整理出受訪者提出會影響他們評估出櫃抉擇的因子，其份量比重因人、因學校文化與關係脈絡、因當時社會氛圍而異，絕非等值等量等比重，故解讀此圖時，需搭配時間軸的演進一併思考與詮釋。而其中同志認同與教師認同交集處之標的「出櫃」在此指的是出櫃抉擇的思考，而非指稱同志教師一定要公開自己的同志認同。在本研究中所有受訪者向

我們展現了他們在職場上對於如何使用自己的生命經驗與認同有其細緻思考與評估，最後他們採用各類最有利於學生以及自己也能接受的方式與學生「相遇」，關注此決策歷程比結果作法更為重要與珍貴。

討論與建議

(一) 同志身份認同與出櫃經驗對教師教學與職涯發展的影響

1. 在異性戀為主流文化的職場關係脈絡中難找到非主流自己的位置

本研究結果諸多例子顯示同志身份在教師生涯發展中可能因為反同的上司或同儕而帶來不利因素，或者因為同志教師曾在視異性戀為常態的大環境受到不當對待（如家人或重要他人的否認、不接受或歧視），讓同志教師感到在職場出櫃現身可能不安全、可能會遭到同事甚至非議討論而為帶來學校麻煩，以上結果呼應現有國內同志教師職場經驗相關研究（林恩莉，2019；施毓琳，2005；袁逸農，2014；謝婉琳，2017；鍾寧，2019）。我們聽到許多受訪者使用「保守」來形容他們所處的校園職場文化，這當然是他們與同儕教師互動的主觀感受，但互動時所產生隱微的人際壓力、揣測自己能說以及不能說出口的內容在現場氛圍中會怎麼被解讀與詮釋，這箇中的默契只有當事人最知道。若將這些所謂「保守的校園職場文化」和「隱微或直接不當對待」放在關係脈絡下來檢視，則可將這些主觀和客觀經驗理解為「非單一／特殊件」，而是同志教師在異性戀主流文化的職場關係脈絡下所經驗到身為小眾／非主流的辛苦。華人文化重視關係是因為我們知道關係包含著雙向的情感束縛，除長期情感附著與親密感外，還包含著重複資源交換。當同志教師在環境中被時刻提醒異性戀才是脈絡中的主流、而不符合主流規則可能會遭受到嚴厲的檢視批評或寬容（如小桃所處重視傳統性別角色分工的國小環境、小安曾因同志身份險遭無法完成實習以及被「可惜」未來無法擔任主管、Cindy 看到輔導同仁嘗試要「改正」同志學生的行為等），當非主流的個人失去個人控制感、似乎自己的生涯只能被決定，也難怪同志老師會選擇站在「友善同志的異性戀」這個保護傘下。研究中的同志老師一再提到在出櫃前需要評估對方是否真正友善同志，以及擔心出櫃後會影響到職場生存，但除小安實習以及大刀少女教職升等的經驗外，似乎又沒有受訪者提出自己的工作權真的因為出櫃而被受影響，或許在這邊我們可能可以解讀此「生存」更廣義的來說，可謂是在錯綜複雜的校園職場人際關係中的生存感，畢竟在華人集體主義的關係脈絡中，社會性死亡等於無法生存，也因此 Cindy 提到她想找同志教師盟友以及有被認同的需要。

2. 異性戀主流文化與教師專業形象概念的交會

本研究結果第二大討論重點是關於教師專業形象與具有污名化標籤的同志身份之交會，本研究中自小學至高中任教的四位受訪者皆意識到同志／非異性戀的身份具有其污名性，因此他們皆「有意識地選擇」以友善同志之異性戀或倡議者之形象作為他們教師專業的公開宣稱，而刻意避免使用污名化身份標籤，因為只要其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不會與「同志」這個可能遭貶抑者（discreditable）之身份有所連結（高夫曼，1963/2010），而限縮定位在「教師」這個受到社會相對尊重的職業中，便能在以異性戀為主流之教育界中站到相對安全的位置。又前述文獻探討中曾提到同志身為領導者角色時，可能掙扎於僅被旁人關注同志認同而忽略專家身份與能力，而非是具同志認同的專家（Fassinger et al., 2010），故本研究中唯一的大學教授大刀少女非常強調自身身為教師跟研究者的專業。但實際上大刀少女的專業表現仍遭到同事不專業對待，回到其他四位受訪者主觀描述的教育職場上，異性戀主流文化價值評判及喜好仍然能透過人際互動關係脈絡來運作。

3. 受文化脈絡影響的師生關係：「利他」與「親親」準則讓老師勇於行動

我們在本研究中也看到仍然有同志教師願意在師生關係中展示具脆弱性的少數認同，四位高中端以下任教之研究參與者雖然主要教學現場並沒有出櫃，但當提到少數幾個跟個別學生出櫃的經驗和例子時，都不約而同傳達了「雖然危險，但我仍願意為了學生的需要而出櫃」，坦承同志身份的

真實帶來關係中的親密感以及能給同志學生更好的支持，對於選擇不以同志身份現身在教學中的同志教師仍致力帶給學生多元觀點學習，這個研究結果與國外研究強調同志教師出櫃主要目的為渴望當真實的自己或示範真實性不同（駱芳美，2017；Nielsen & Alderson, 2014），或許可用在臺灣教育現場的文化脈絡是以華人關係主義中的利他而非歐美個人主義中的真實表達自己來解釋，而此利他概念或許還跟儒家文化師生關係中強調老師對於學生的全然無私付出、照顧與保護之「親親」準則有關。

本研究最重要的發現，即為同志教師之非主流身份認同與生命經驗對其教師職涯發展與教學作為有深遠影響：教師的生命經驗與其教學理念、教學方式息息相關，非單純知識轉述的教學機器，因此同志生命經驗、身份認同與其教師認同和經驗絕非公私領域的黑白劃分，同志教師所經驗到的職場氛圍能否讓他安心在其職場充分發揮其所長，決定他是否能盡力將其理念跟策略貢獻在教育中。因此，建立性別友善的教育環境不但關乎學生的福祉，對於同志教師能充分貢獻所長、教育與照顧所有學生亦同樣重要。我們不認為所有同志教師都有必要且應該要在職場出櫃，但若教師因為擔心人格尊嚴或工作權因污名歧視受損而需刻意隱瞞或說謊，則可能致使教師人格權以及學生的受教權受損。我們希望藉由本研究作為提醒教育界的響鐘，無論在任何一個教育階段、師資培育養成階段，都希望能增加彈性及多元觀點，讓教育環境涵容與尊重多元樣態的師生與觀點，成為真正培育尊重人權、滋養多元創造與創新人才的搖籃。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旨於了解同志教師之多元認同如何影響其職涯發展與其在教學場域的經驗，對象雖涵蓋不同性別、性取向、教育階段、教學年資與服務區域之教師，但因人數及所蒐集之資料量、所使用之研究典範與分析方法，在研究結果解釋上具有限制性，讀者在解讀研究結果應避免做泛論套用至全體同志教師。當然我們不排除其他多元認同的交織，但由於本研究聚焦於同志身份認同與教師認同之交織，故僅根據資料分析結果呈現。本研究於設計初期便定位在探討同志教師在教育現場中的出櫃經驗，當中隱含第一作者欲探討並鼓勵之出櫃行為與為友善校園倡議之立場與價值觀，此立場和價值觀可能將研究發現更聚焦於「發現與探討出櫃可能會帶來益處」之積極面，然則在研究中後期，研究團隊討論激盪幫助第一作者看到研究參與者們所表達真實主觀的不出櫃理由，而研究團隊也來回檢討研究結果以確保研究結果之信實度。故研究者之立場與價值觀在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與討論之觀點取材方面有其影響力，而此影響亦可能為本研究結果最大開放與彈性度之限制。

（三）未來研究與實務建議

1. 未來研究建議

目前關於同志教師研究之文獻以累積有不少質性研究發現，未來研究或許可根據現有質性研究建議進行量化資料蒐集，分析社會環境、教育職場友善或恐同程度、教師同志認同階段及出櫃程度、教學相關年資或能力對同志教師教學效能與職涯發展滿意度之影響，也可從學生與家長的觀點蒐集對同志教師接受度相關資料，幫助我們更進一步了解社會與教育環境、同志教師的多元文化認同、職場出櫃狀態、其教學經驗與教學成效之間的關係。另由於本研究僅探討同志認同與教師職業認同這兩個範疇的交會，未來研究可開放探討其他多元文化認同交織（intersectionality of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以豐富我們更瞭解多元生命經驗及認同對教師職涯經驗的影響。

2. 未來師培教育建議

傳統師培教育著重培養教師教學理念，著墨於專業認同的研究較少，教育類期刊中以「認同」做關鍵字多在諮商輔導領域（洪莉竹、陳秉華，2003；許育光、刑志彬，2019），顯示現有研究在教師專業認同闕如。本研究結果凸顯了被視為私人的多元文化認同豐富教師教育理念及教學熱忱，教師能轉化自身多元生命經驗成為教學與輔導學生的養分、帶給學生學習機會與資源，因此建議未來師培教育在多元文化教育中可納入教師多元文化認同的反思，藉由鼓勵未來教師探索與認同自身

所擁有的多元文化以及其與專業之整合，讓未來老師更能接納與尊重學生生命的多元面向，亦可呼應林碧雲（2008）倡議之性別平等教育的「全球在地化」，並非複製國外經驗，而是真正由臺灣教師的本土生命經驗中長出的具性別敏感與性別平等意識之教育。

參考文獻

- 余金來（2001年6月5日）：〈教師自曝同志身份桃縣議員認為不當〉。ETtoday。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69 [Yu, C.-L. (2001, June 5). *Jiaoshi zipu tongzhi shenfen taoxian yiyuan renwei budang*. ETtoday. http://gsrat.net/news/newsclipDetail.php?ncdata_id=969]
- 何春蕤（1997年7月20日）：〈談同志教師〉。何春蕤論述資料庫。 https://sex.ncu.edu.tw/jo_article/1997/07/談同志教師/ [Ho, J. (1997, July 20). *Tang tongzhi jiaoshi*. Josephine Ho Dissertation Database. https://sex.ncu.edu.tw/jo_article/1997/07/談同志教師/]
- 林恩莉（2019）：《中學女同志教師於教育職場現身經驗探究：女性主義觀點》（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Lin, E.-L. (2019). *Exploring coming out experiences of high school lesbian teachers in education field: Feminist perspective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林碧雲（2008）：〈全球化對性別平等教育的影響及其對臺灣的啟示〉。《當代教育研究季刊》，16（3），31–57。 [Lin, P.-Y. (2008). The influence of globalization on gender equity educati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16(3), 31–57.] <http://doi.org/10.6151/CERQ.2008.1603.02>
- 洪莉竹、陳秉華（2003）：〈諮商員專業發展歷程之文化反省經驗〉。《教育心理學報》，35，1–17。 [Hung, L.-C., & Chen, P.-H. (2003). Cultural reflections in counselo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35, 1–17.] <https://doi.org/10.6251/BEP.20021216>
- 施毓琳（2005）：《男同志教師性傾向認同歷程與教育職場的生存策略》（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Shih, Y.-L. (2005).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process for gay teachers and their survival strategies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洪巍峯（2014）：《男同志教師的性傾向認同與其同志教育態度》（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Hung, W.-F. (2014). *Gay teachers'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and their attitude of LGBT education*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高夫曼（2010）：《污名：管理受損身份的筆記》（曾凡慈譯）。群學出版社。（原著出版年：1963） [Goffman, E. (1963).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F.-T. Tseng, Trans.). Socio Publish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3)]
- 徐巧玲、周幸儀（2016）：〈基督徒同志教師生命衝突與轉化之敘說研究〉。《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10（1），86–113。 [Hsiu, C.-L. & Zhou, X.-Y. (2016). The narrative research on the life conflict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Christian gay teacher. *NPUS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edagogy*, 10(1), 86–113.] [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4](https://doi.org/10.6618/HSSRP.2016.10(1)4)
- 袁逸農（2014）：《男同志教師的自我認同歷程與職場中的性別經驗之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

-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Yuan, I.-N. (2014). *A multiple case study of gay teacher identity process and gender experience in the workpla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許育光、刑志彬 (2019)：〈臺灣學校心理師何去何從？——從現況評述、課程檢核到培育反思〉。《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7(3)，35-64。[Hsu, Y.-K., & Hsing, C.-P. (2019). Phenomenon review, curriculum investigation, and reflections on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school psychologist in Taiwan.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Research Quarterly*, 27(3), 35-64.] [https://doi.org/10.6151/CERQ.201909_27\(3\).0002](https://doi.org/10.6151/CERQ.201909_27(3).0002)
- 葉人瞄 (2009)：《國內女同志體育教師在家庭／職場／運動場的現身／隱身經驗》(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Yeh, J.-M. (2009). *Taiwan lesbian P. E. teachers' experience of coming out/be closeted in the school and playground*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趙淑珠、郭麗安、劉安真 (主編) (2008)：《「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教育部。[Chao, S.-C., Kuo, K.-A., & Liu, A.-C. (Eds.) (2008). *"Renshi tongzhi" jiaoyu ziyuan shouce*. Ministry of Education.]
- 駱芳美 (2017)：〈勇敢當自己！？——大學教師課堂「出櫃」的探討〉。《輔導與諮商學報》，39(1)，39-66。[Law, F.-M. (2017). Let me be me!?!--A study of faculty coming out in the college classroom. *The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39(1), 39-66.]
- 謝婉琳 (2017)：《杏壇中不能說的秘密——國小女同性戀教師生命故事之敘說研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Hsieh, W.-L. (2017). *The unspeakable truth of education- The study of the life of lesbian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 鍾寧 (2019)：《教育圈看不見的彩虹——國小女同志教師在職場不出櫃的歷程敘事探究》(未出版碩士論文)，國立嘉義大學。[Chung, N. (2019). *Invisible rainbow in education- A narrative inquiry into the experiences of elementary school lesbian teachers hiding sexual orientation in the workplace* (Unpublished master's thesis).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 Blount, J. M. (2006). *Fit to teach: Same-sex desire, gender, and school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UNY Press.
- DePalma, R., & Atkinson, E. (2006). The sound of silence: Talking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and schooling. *Sex Education*, 6, 333-349. <https://doi.org/10.1080/14681810600981848>
- Epstein, D., & Johnson, R. (1998). *Schooling sexualities*. McGraw-Hill Education.
- Fassinger, R. E., Shullman, S. L., & Stevenson, M. R. (2010). Toward an affirmative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leadership paradigm. *American Psychologist*, 65, 201-215. <https://doi.org/10.1037/a0018597>
- Goodman, J. A., Schell, J., Alexander, M. G., & Eidelman, S. (2008). The impact of a derogatory remark on prejudice toward a gay male leader.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8, 542-555. <https://doi.org/10.1111/j.1559-1816.2008.00316.x>

- Griffin, P. (1991). 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among lesbian and gay educato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4, 189–202. <https://doi.org/10.1080/0951839910040301>
- Haddad, Z. (2019). Understanding identity and context in the development of gay teacher identity: Perceptions and realities in teacher education and teaching. *Education Sciences*, 9(2), Article 145. <https://doi.org/10.3390/educsci9020145>
- Herek, G. M., & Garnets, L. D. (2007). Sexual orient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3, 353–375.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clinpsy.3.022806.091510>
- Herek, G. M., Gillis, J. R., & Cogan, J. C. (2009). Internalized stigma among sexual minority adults: Insights from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6, 32–43. <https://doi.org/10.1037/a0014672>
- Hynes, W. (2012). *Class outing* (EJ977069). ERIC. <https://eric.ed.gov/?id=EJ977069>
- Lieblich, A., Tuval-Mashiach, R., & Zilber, T.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SAGE Publications.
- Mays, V. M., & Cochran, S. D. (2001).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adul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91, 1869–1876. <https://doi.org/10.2105/AJPH.91.11.1869>
- Nielsen, E.-J., & Alderson, K. G. (2014). Lesbian and queer women professors disclosing in the classroom: An act of authenticity. *The Counseling Psychologist*, 42, 1084–1107. <https://doi.org/10.1177/0011000014554839>
- Nixon, D., & Givens, N. (2004). ‘Miss, you’re so gay.’ Queer stories from trainee teachers. *Sex Education*, 4, 217–237. <https://doi.org/10.1080/1468181042000243321>
- Rasmussen, M. L. (2006). *Becoming subjects: Sexualities and secondary schooling*. Routledge.
- Rudoe, N. (2010). Lesbian teachers' identity, power and the public/private boundary. *Sex Education*, 10, 23–36. <https://doi.org/10.1080/14681810903491347>

收稿日期：2020年12月28日

一稿修訂日期：2020年12月28日

二稿修訂日期：2021年03月22日

三稿修訂日期：2021年05月27日

四稿修訂日期：2021年06月30日

接受刊登日期：2021年06月30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22, 53(3), 617–642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 O. C.

Dear Students, in Fact, I Am...: LGBTQ Teachers’ Decisions of Whether to Come Out at Work and Their Teaching Experiences

Hung Chi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Shu-Yang Li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Asia University

Yi-Chia Chiu

Student Guidance
and Counseling Center,
Miaoli City

Yun-Ting Li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Shih-Ying Chen

Songshan Workshop,
Children Are Us Foundation

Objective: Several studies (Chung, 2019; Hsiu & Zhou, 2016; Shih, 2005; Yeh, 2009; Yuan, 2014) have reported that Taiwanese lesbian and gay teachers do not often consider “coming out,” that is, disclosing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at school due to unpredictable risks, such as stigmatization or loss of their jobs or teaching qualifications due to complaints from parents. Chao et al. (2008) reported that LGBTQ teachers may disguise themselves, indirectly or openly come out at work, or separate their professional and personal lives.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have presented reasons and strategies for LGBTQ teachers not coming out, few studies investigated the intersections of LGBTQ identities and career practices, including in teaching practices and decisions regarding whether to come out at work.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LGBTQ teach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their experiences of coming out or not coming out to their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in the workplace. This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intersections of LGBTQ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career practices among LGBTQ teachers. **Method:** We interviewed five LGBTQ educators (3 biologically female and 2 biologically male teachers; one of whom identified as lesbian, one as questioning, one as bisexual, and two as Tongzhi, a gender-neutral term for a sexual minor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orking at different educational levels (one at an elementary school, three at middle schools of different levels, and one teaching in a 4-year university course) and learned why and how they intentionally chose to disclose or not to disclose their LGBTQ identities in the workplace and how those experiences affected their teaching work. A narrative paradigm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how the teachers’ LGBTQ identities, personal beliefs, and professional and educational values intertwined and how their LGBTQ identities influenced their professional situations and career development. **Results:** We collected the participants’ accounts of their LGBTQ identities and identity development process, their teaching philosophies and experiences, the attitudes toward LGB issues they have encountered in their workplaces, and how they presented themselves to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in their workplaces. One participant experienced discrimination from his supervisor when in teaching practicum, which almost caused him to lose his teaching qualification. Another participant reported her experience of being sexually harassed by a male faculty member, which later led to obstacles in the tenure process. Others reported hearing discriminatory language against LGBTQ individuals, or they worried that their school principals would yield to conservative parents and not support them at work,

which led them to protect themselves by presenting themselves as heterosexual allies at work. All the participants incorporated gender equity perspectives and materials in their teaching and services. Although only the participant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was openly out to her students, two more participants reported that they had privately come out to their LGBQ students to support them, indicating that despite the risks of negative outcomes at work, some LGBQ teachers are willing to reveal their “real identity” for their students rather than for themselv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intersectionality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LGBQ (private) identity in school and social contexts. In this model, Taiwanese LGBQ teachers consider conservativ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s and potential protests from parents to be obstacles to coming out at schools. However, they are more willing to come out to more effectively provide learning support to LGBQ students and to build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such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shared stigmatized identity. The model also considerably accounts for temporal factors because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ontexts are time-dependent. LGBQ teacher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LGBQ identity development process tend to make different decisions because of the impact of society on 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perspectives. For example, Taiwan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 748, which is known as the first same-sex marriage case, was announced in May 2017 and was passed and put into effect in 2019. From 2017 to 2019, Taiwanese society experienced enormous pressure from both proponents and opponents of same-sex marriage. LGBQ individuals may choose to expend the energy required to be “out and proud” or to hide and suppress their identity depending on their psychological strength or changes in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that come with societal progress and personal identity development. The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drasticall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for Interpretation 748, and the resulting societal changes have considerably affected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them. Discussion: The results of the present study indicate that Taiwanese LGBQ teachers, as sexual minorities, experience difficulties in finding a safe spac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ich is dominated by heterosexuality. Although none of the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real job loss, we might interpret their worries not as internalized homophobia but as existential anxiety regarding social survival, especially because social death has serious outcomes in collectivistic and relation-oriented Taiwanese society. Regardless of the risks and lack of personal advantages associated with coming out, Taiwanese LGBQ teachers are still willing to come out for their students’ benefit. The intention and motivation of the actions of the teachers in the present study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hose reported in North American studies (Nielsen & Alderson, 2014), in which LGBQ faculty reported coming out for their own needs of being genuine or true to their personal identities. We believe that the intention of Taiwanese LGBQ teachers in coming out is based on the culturally informed principles of altruism and compassion. The most important implication of the study is that LGBQ teachers’ minority identities and life experiences strongly affect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that is, the ability of LGBQ teachers to put their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d strategies into practice and contribute at work depends on the how safe they feel in their work environment. Therefore, ensuring that school systems are accepting of gender- and sexual minorities is crucial not only for maintaining the optimal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achieve their goals but also for establishing a culturally sensitive and open work environment for teachers to exhibit their best teaching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can elucidate the intersections between LGBQ teachers’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s and their LGBQ identities;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lifestyl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se intersections. Discussions of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and the effect of such identities on teaching practices are not regularly incorporated into teacher training in Taiwan, and more research on intersectional identities must be incorporated into teacher education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Education is a career of life influencing life; therefore, promoting awareness of how identities are shaped by life experiences among future teachers is crucial. Furthermore, LGBQ identities and issues related to coming out in different career fields must be thoroughly investigated in the future to raise awareness of homophobia and sexual prejudice and to reduce the oppression of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Keywords: coming out, homophobia, LGBQ teachers, sexual prejudice, Tongzhi

